

思还故里拓跋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文物

撰文/刘连香

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游览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作为美国搜刮中国文物的七大中心之一，所藏中国文物必然很多。但当真正踏进该馆的亚洲文物展厅时，还是被其陈列的中国文物所震惊，尤其展览的部分北魏随葬品和佛教雕刻，可谓国之重宝，在中国境内都难以找到类似珍藏。这体现出该馆极强的文物鉴别能力和展出藏品之精妙。

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简称MFA)始建于1876年，是世界上收藏最全面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保存文物近45万件，中国藏品约8000件，包括书画、雕塑、纺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和装饰艺术品，绝大部分为美术馆永久收藏。波士顿美术馆在这么多藏品中特别青睐北魏文物，体现出其征集人员独到的眼光，充分看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北魏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取代汉族“正统”王朝的统

一政权，元代、清代则在其之后，为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做出各自的贡献。拓跋魏作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马上民族，具有开创先河之功，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等举措具有划时代意义，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惜，北魏迁洛仅仅四十年即分崩离析，叱咤风云的孝文帝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对自己用金戈铁马、阴谋阳谋甚至斩杀太子为代价打下的江山转瞬即逝而伤悲嗟叹。更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被他诏令死葬北邙的拓跋皇族陵墓随葬品、彰显大魏佛教信仰的精美石窟雕刻，却在一千五百年后沦落到相隔万里、大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犹如5世纪末被迫南迁的一部分皇族拓跋氏及其内入诸姓渴望回到故土平城一样，今日漂泊到美洲的北魏文物面对祖国和固有文化，思归之心何其相似。

一 墓葬文物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采取改汉姓、言汉语、着汉服等一系列汉化政策。为了彻底打消拓跋鲜卑人北归平城(大同)的念头,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魏书·帝纪第七下》)。这一诏令决定了北人必须死葬洛阳,从而在洛阳北邙山即今洛阳北郊及孟津南部一带形成以魏孝文帝长陵为核心的帝王陵墓区,范围主要在瀍河两岸。围绕帝陵向外扩大为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名门望族等墓葬范围(参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墓志中常见的“长陵之域”、“窆于西陵”、“景陵东阿”等即指该区域,其间的大量北魏墓葬被盗掘,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流失海外,波士顿美术馆保存的部分文物属于其中精品。

1. 冯邕妻元氏墓志并盖

1926年洛阳孟津东陡沟村西出土的《魏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并盖,是北魏墓葬文物的典型代表。墓志记载元氏为“河南郡洛阳县崇恩里人也,昭成皇帝之曾孙,常山康王之长孙,司空文献公之元女”,

说明墓主人是拓跋鲜卑皇族之后,迁洛之后改为汉姓元氏,并自称河南洛阳人。虽然正史不载,但仍属皇族余脉。

根据《魏书·列传第三》“常山王遵传”及洛阳出土《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晖)墓志铭》记载,元氏为昭成皇帝之后,其曾祖为常山康王素,其祖为河间公元德。其父为司空文宪(献)公元晖,“献”、“宪”互通。元氏“以大魏正光三年(522)四月壬戌朔日卒于艾涧之俟庭……以其年十月廿五日葬于景陵之南冈”,即在景陵之兆域。北魏时期,墓志大小与等级制度的对应关系比较严格,该墓志74.3×73.4厘米,志盖与墓志接近,说明墓主人的品级较高。墓志盖及墓志四侧面满刻减地浅浮雕各类神像及怪兽图案十八幅,志盖中心为一盛开仰莲,周围云龙环绕,四角各一怪兽,分别自名攫天、哈嚙、拓仰、拓远;墓志四侧面雕刻类似神兽,题铭包括:乌获、辟电、攫撮;挠撮、掣电、欢喜、寿福;回光、掬远、长舌;挟石、发走、获天、啮石则(图1)。有学者认为这些怪兽为粟特人的祆教神祇或天神,本人推测则可能为北方突厥文中各种镇墓、驱邪动物名称的音译。志盖顶部中心有铁环遗痕。该墓志并盖出土后首先归洛阳郭玉堂,后被固始许光宇所藏,不久运至北京,售往日本,1933



图1 冯邕妻元氏墓志并盖

年波士顿美术馆用安·里维斯·润腾基金(Anne Lewis Renton Fund)购买后存于该馆至今。冯邕妻元氏墓志文凡二十六行,满行二十六字,字体宽博,雍容大度,瑰丽精整。由于出土仅几年即流失波士顿,志文保存相对完好,不仅法度谨严,而且笔划爽利流畅,字迹饱满清晰,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之八分书即魏碑体的佳作,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2. 宁懋石室

1931年2月在洛阳孟津县翟泉村北邙山半坡的墓室内,出土一座小型北魏石构房屋建筑,即宁懋石室(图2)。石室出土后不久即售往上海,后流失海外。据波士顿艺术馆资料来源显示,该馆1937年从纽约的山中商会(Yamanaka)以2万美金的价格(部分互换)购买,于当年4月1日入

藏,所用款项来自安娜·米切尔·理查兹和玛莎·塞尔斯比基金(Anna Mitchell Richards and Martha Silsbee Funds)。

宁懋石室长200厘米、高138厘米、进深78厘米,由地基、四面墙壁、前后屋顶及屋脊等数块石板组合而成,为悬山式仿木结构,面阔三间,左右次间前墙均有墙壁,中间敞门。屋顶雕刻出瓦楞、屋脊,内外墙壁均以阴线刻出人物绘画,门外两侧为身披铠甲、执戟仗剑的二武士;两面山墙外上下分栏刻丁兰、董永、董晏四组孝子和历史故事;室外后壁刻三组人物画像,每组二人,主人宽袍广袖,衣褶飘飞,分别由侍女陪同,形体雍容大度,神态互相呼应(图3),其中一人所簪貂尾清晰可见。室内各壁亦各有线刻,前壁内侧左右为庭院、庖厨,以帷帐间隔;室内左右山墙是依仗

出行,表现乘骑、牛车等动态场景。与石室同时出土的有北魏横野将军甄官主簿宁懋墓志一方,说明该石室造于孝昌三年(529)(参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年第2期)。在前壁外侧武士两侧,各有一句榜题,分别为“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造”字样,字体随意瘦长,与典型魏碑体的规整浑厚风格不同,反映出该石室由兄弟二人为父亲宁懋所造。该石室线刻是北魏晚期成熟的作品,人物衣着汉化,背景复杂,反映出当时贵族生活场面,为北魏时期石刻艺术之瑰宝。

有人曾认为该石室应为墓上祀宗祖的享堂(宗祠),但从其出土于墓中及尺寸可知,当为石椁之属。这种葬具承袭了汉代地表石祠堂与墓室石刻相结合的方式,在墓室中使用画像石棺、仿木结构石椁或石室。中原地区汉代墓葬地表普遍修建享堂,是后世子孙祭享先祖之所,目前发现的石祠堂已有40多处,主要集中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西北部一带,山东嘉祥武氏祠堂、长清孝堂山郭氏祠堂等已为人熟知。地面有石祠堂的墓葬,地下墓室多为石质,且均有画像。北魏将汉代地上地下特征融为一体,在墓中使用石雕葬具,太和元年(477)宋绍祖石椁、智家堡石椁等,均出土于其早期国都平城。洛阳宁懋石室是迁都之后的代表,在北魏石刻中具有典型意义。石室表面人物造

型与场景结构布局与当地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石棺床、龙门石窟北魏造像中的礼佛图像等相似,说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已经渗透到丧葬体系的细微之处。稍后的北周史君石椁、安伽墓围屏石榻等在用途方面与宁懋石室有继承关系,但其上雕刻的花纹则体现出入华粟特人的风格,与冯邕妻元氏墓志及盖上所雕神兽



图2 宁懋石室



图3 宁懋石室后壁画像



图4 北魏石棺床前档

纹饰和题名有更多联系,反映出拓跋鲜卑与汉文化及粟特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代表了当时中国多元文化之间的渗透与影响。在这方面,似乎又与当今美利坚移民国家对于世界各种文化的接纳与包容有相似性。

除了以上北魏墓葬文物之外,波士顿美术馆中另有1962年入藏的石棺床前档,长212.3厘米、高53厘米,其上雕刻精美图案,尤以中间兽首和两侧狮子造型突出(图4)。兽首在北魏时期非常典型,汉魏洛阳故城发掘出土的北魏瓦当、建筑构件、墓门铺首等上都有类似造型,它们构图相似,用途广泛。狮子形象已经从东汉的四肢交错行走状演变为前肢直立、后肢蹲踞的形象,狮身瘦削,头部周围鬃毛蓬松,在胸前分为左右两部分,似团花向上拱托头部。

墓葬出土的其他随葬品还有武士俑、站立男俑女俑以及陶马等。这些陶俑一般为灰陶,个别施彩,如58.482号武士俑,36.140号陶马,尚可看到原来器物表面

所涂色泽。陶俑小者不及20厘米高,如1964年入藏的64.67号,尺寸为17×4.7×3.1厘米;大者高达五六十公分,如1950年购买的一对站立女俑高度均达63厘米。它们与上文的墓志、石室及石棺床等都反映了北魏时期的丧葬习俗。

二 佛教造像

除以果敢的魄力迁都汉化之外,拓跋鲜卑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其一大文化特色,并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就,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从北魏开始雕琢。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分为造像碑和单体造像两大类,其中不乏原属两大石窟者,体现出当时繁盛的佛教艺术。

1. 造像碑

波士顿美术馆保存北魏佛教造像碑中,两件刻有明确纪年,为判定其制作年代提供了准确依据,在我国佛教造像中具有典型意义。一为正始元

年(504)造像残碑,1923年入馆,为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的收藏。该造像碑上部残损,仅存下半,高61.3厘米、宽51.4厘米。最下一层为供养人礼佛场景,功德主二人手持莲花在比丘引导下徐徐前行,身后有侍者擎华盖,其上飞天翱翔,表现出一派祥和景象。左侧刻题记两行:“魏正始元年岁次甲申五/世亡父智登七世士。”其上一层中间一人头戴高笼冠,背靠立柱跪坐,右手放腿上,左手上举持一物,周围三侍女均梳双髻,前后各一人手持莲花,一坐一立,最后一人拢袖而立。

永安二年(529)五十人等造像碑也是1923年入藏,由卡罗琳·鲍尔奇·艾伦基金和克莱米尔·奈斯密斯·华莱士基金(Caroline Balch Allen Fund and Cranmere Nesmith Wallace Fund)捐助,高191厘米、宽67厘米(图5)。造像碑以整石雕刻出碑首和碑身两部分,碑首六螭缠绕呈弧状,螭身雕刻鳞片,碑首阴阳均浮雕螭首、胡须、前后爪及尾部,形成复杂装饰,中间偏下为小龕。碑阳龕内为一带头光的立佛,两边各有一人,周围九龙相围,造型奇特。碑阴龕内为一坐佛。碑身阳面上部分层雕刻图像,中间一龕刻一坐佛及二菩萨,下部阴刻碑文,纪年为:“永安二年己酉二月癸未朔五日丁亥。”碑阴上下分为七层,上面四层各分四格,下三层



图5 永安二年五十人等造像碑

为八格,主要雕刻开明主、邑主等造像及题记,图案相似,多为乘马及依仗造型。

另有一件北魏佛教造像碑(图6),

无纪年。该造像碑是1906年由当时兼任波士顿美术馆远东部主任的日本著名美术家冈仓觉三(天心)以3200元大洋从中国购买的34件文物之一。碑阳为一坐佛,结跏趺坐,佛像衣折细密,后有舟形背光,满刻蔓草等花纹。碑阴分为七个小龕,各刻一坐佛。

2. 单体造像

单体佛教造像以来自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者价值最高,反映出当时北魏的佛教盛况,也体现出我们文物流失之严重。

1950年入藏的一对砂岩石雕供养菩萨造像,来自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一号窟。编号为50.1758、50.1759,为查尔斯·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的

遗产和收藏,高49.6厘米、宽18厘米。该对菩萨左右对称,造型相似,均作一腿弯曲、一腿跪地姿势,双手合十虔诚敬拜。两尊菩萨头梳高髻,身着交领衣,腰间束带,衣袖宽大,面部瘦削,巨耳垂肩。此对造像雕刻简单质朴,刻于北魏迁洛之前的480-500年之间。二菩萨很可能属于弥勒三尊像的造型,左为法华林(音轮)菩萨,右为大妙相菩萨。

原龙门石窟的北魏思维菩萨呈现出更加成熟的造型。思维菩萨1936年入藏,高61厘米、宽44.5厘米,编号36.414,由乔治·耐克森·布莱克基金(George Nixon Black Fund)购买之后捐赠给美术馆。菩萨呈坐姿,造型写实生动,左腿下垂,右腿半结跏趺坐,



图6 北魏佛教造像碑

右肘支在右膝部,手部托腮,陷入沉思,面部朝向右下方,头上高冠稍稍前倾,身下服饰皱褶稠密,覆盖台座。其神态和雕刻技法比龙门石窟北魏洞窟皇甫公窟北壁的思维菩萨更加灵动,尽管体量不大,却可视为龙门北魏造像之佳品。

北魏大力推行佛教,并由早期皇帝等同于佛向皇帝敬拜礼佛发展,大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五尊巨佛就是依据“令如帝身”而雕刻,是拓跋鲜卑早期五位皇帝的象征。龙门石窟古阳洞、宾阳中洞、皇甫公窟等北魏洞窟中的多幅帝后礼佛图则是皇帝自降身位、虔敬崇佛的表现。到北魏延昌年间,“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国都洛阳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波士顿美术馆所藏北魏时期造像碑和原属于两个石窟的单体佛教造像都是当时拓跋鲜卑一味佞佛的真实写照。

从以上波士顿美术馆所藏北魏文物可以看出,拓跋鲜卑文化明显表现为两面性:在丧葬方面,极力吸收汉文化因素;在佛教信仰方面,拓跋氏则保存其传统习俗。

魏孝文帝当年迁洛之后,一部分

臣僚思归北土,曾经蛊惑太子元恂欲召牧马轻骑奔代,被其父视为“违父背尊”,为国之大祸,废为庶人,不久以谋逆罪赐死,所有拓跋氏及其他北人均永居河洛,返回代北之愿破灭。之后的拓跋氏逐渐与汉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之后,拓跋文化遗存却又以各种途径沦落北美,再次踏上漂泊之羁旅,拓跋鲜卑重蹈历史之覆辙。

回归的路有多远?似乎并不比当年孝文帝所设障碍易于逾越。文物遣返法规虽然已经在世界多个国家制定实施,中国也加入了反对盗窃和毁坏文物的海牙公约。近些年来,甚至有多次文物成功归还的先例,如2004年美国中华艺术研究会会长陈哲敬夫妇将自己购买的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龕佛头像归还龙门石窟。但文物追讨涉及国际之间非常复杂的问题,道路非常漫长。拓跋鲜卑文物何时能够回归祖国,我们翘首期盼。■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北魏后期拓跋鲜卑民族融合研究——以出土墓志为中心》成果,编号:10YJA850028。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